

# 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及其不满

王晴飞

“文学性”是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当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反复被人们提及、讨论甚至辩难,说明这又是一个不可能有确定结果或者说答案的问题。众所周知,最早提出“文学性”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罗曼·雅各布森,他对“文学性”有一个很抽象的界定,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sup>(1)</sup>也就是说,“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一种特性。这样的话,似乎是说了什么,似乎又什么都没说。“没说”是指看完这个界定,我们仍然无法确知“文学性”到底是什么;“说了什么”则是指,虽然我们仍然不能确切地知道“文学性”等于什么,这个说法却给我们指示了一个方向,或者说提供了一个讨论文学的方法和场域——“文学性”就像中空的容器,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往里面填充各种内容。也正因为“文学性”的“空”,文学研究者才会不断回到这个原点,在各自的语境中,根据自身对语境的理解,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重新诠释,打开对文学理解的新的空间,如老子所说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重提“文学性”,自然意味着“文学”或者说是“文学性”出了问题,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首先是文学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所以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也是文学研究者对自身及所在学科的反思。提倡“文学性研究”,自然意味着目前存在着大量的“非文学性研究”甚至“反文学性研究”。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算是“文学性研究”呢?这个问题也如同“文学性”一样,无法给出一个明晰、确切的答案。如张清华教授所说的,“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从来没有消失过,又何谈‘重提’?”<sup>(2)</sup>这里同样是一些“似乎是

说了什么,似乎又什么都没说”的话,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现在的语境下,“文学性”已经不可能做本质主义的理解,“文学性”界限的模糊性与流动性也成为共识,一个坚固的界限明晰的“文学性”定义成为不可能,所以研究者一方面提倡“文学性”,一面又要同时解释本体性的“文学性”其实并不存在,避开“本质主义”,给“文学性”留下更多阐释的空间,唯恐把活生生的“文学性”说“死”了。

这样的提倡,指向了当下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即对文学自身价值、特性的偏离,以及对于这一“偏离”的不满。虽然我们无法说清楚“文学性”是什么,但可以退而求其次,考虑一下这个“偏离”是什么,或者说考虑一下文学研究与“文学性”相对的概念是什么,它对“文学性”又造成了怎样的压制或压迫,这样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性研究”中的“文学性”大致指向哪里。

在现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与“文学性”相对的概念,首先是“科学性”。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可称之为“文学研究”的部分,最早往往或是在谈论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时偶有涉及,甚至原本不是谈论文学的话语,却被拿来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即便是谈论文学,也常是只言片语。常见的论文文体,如论诗诗、诗话词话、评点等,在意的也是主观性很强的直观妙悟,很少体系性的创建。

当然,成体系的著作自然是有的,比如“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而在传统时代看似平常在今天却显得惊世骇俗的地方在于,这本文学理论著作,是以骈文写成的。将这一点与其他“文学批评话语”放在一起,便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学批评与文学是融为一体的,文学批评本身也是文学甚至是“子学”的一部分。

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不能称为结论的结论,因为即便是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也是很晚近的事,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如今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是十五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文学的现代含义才不过二百年。”<sup>(3)</sup>不过这个“不能称为结论的结论”也告诉我们,在“文学”尚未从整个生活中脱离出来,在“文学批评”尚未从“文学”的整体中独立出来的时候,它们是融为一体的。

“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广义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是现代化的结果。“文学研究”从母体脱落，自立门户，自然不免产生一定的隔阂，与原有的母体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圆融无间。

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自然也具有一切学科都有的特点，即“科学性”。华勒斯坦在《开放的社会科学》一书中谈及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发展，“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原本“独立而平等的”两个领域，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sup>④</sup>

自然科学的大获全胜，源于它的精确、客观、普遍，成为一种坚硬而确定的知识，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单纯、明确的秩序，而人文科学则因其不够精确、不够客观，因而也就不够科学。所以在所谓的自然、人文、社会三种科学中，其实隐含着一个鄙视链，即：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甚至“人文”而要称之为“科学”，自身就是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对其他人类知识、学问支配地位的体现。既然称之为科学，自然也要有科学的体系，科学的方法，就要把文学中那些不够“科学的”的部分尽量排除，使之“科学”化。

说起来，这倒正是雅各布森预期达成的目标。在雅各布森看来，当时的文学研究不能抓住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因而也不科学），而是将许多文学外部的内容（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网罗在“文学”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免使文学可能沦为其他科学的“不完善的二流材料”。<sup>⑤</sup>雅各布森批评的其实都是在今天看来被称为“外部研究”的内容，而他致力于实现的，是从文学内部（尤其是语言层面）发现其普适规律，使其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可以看出，“文学性”概念的提出，一是预设“文学性”有一个本质性的含义，虽然这个“本质”一言难尽——在雅各布森看来，主要集中在诗性语言与日常

语言的区别方面——但“本质”默认是存在的；二是“文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是文学研究要有“科学”（约等于自然科学）的方法。

正是“科学性”使得“文学”与“文学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才有可能避免印象、感悟式的肤浅的浮光掠影，也使得关于“文学”成为一个可供文学从业者共同探讨的空间，文学批评者可以在同一个话语场中相互印证、共同阐发，推动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而不仅仅依赖于个人性很强的神秘而难以言明也难以被他人理解的直观体悟。当然，科学方法在将文学从其他知识门类附庸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其具有与自然科学研究类似的特点，比如追求准确、客观，因而也会抹杀研究者的个人性，出现远离文学自身特质的可能。

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概念的重要创建者胡适，便是将外来的“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考据”相结合，成为“科学方法”，以此“整理”文学，而他的具体研究实践，则是贯穿着考据精神和历史方法——如对《儒林外史》《红楼梦》作者的考据，和对李宸妃等故事“滚雪球”式的历史脉络研究——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性文本。

在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程千帆看来，中国学术，可以以“义理辞章考据三者”概括，而“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是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唯有最终客观、实证的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sup>⑥</sup>而在以后的几乎整个研究生涯中，程千帆都强调所谓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的结合，其实就是“考证”与“批评”的结合，也希望文学研究者要有一点创作的经验，其实是要以文学经验自身的“体悟”“感受”，使文学研究能够与文学作品自身更为契合圆融，在审美层面理解文学，也使文学研究更具有“文学性”。这其实是对“科学性”在文学研究中支配性影响的不满，要以“文学性”弥补文学研究中“科学性”过盛的不足。

## 二

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现，尤其是当文学研究

从文学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知识门类而言,这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文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文学;就区域角度而言,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认知和理解,难免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所以又会以西方术语、理论剪裁中国文学。这些都不免损坏了“中国文学”自身的整体性,可能使文学沦为“方法”与“话语”的材料。

21世纪以来,国内文学研究界重提“文学性”与“文学性研究”,也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指向。从“文学性”自身的理论背景来看,是经历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文本中心”被打破,文学研究也从俄国形式主义的追求客观性与科学化,转向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和审美自足性,寻求更为开放的“文学”观。<sup>(7)</sup>

而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20世纪80年代出于抵抗意识形态浸染的动机而提出的“纯文学”概念,不仅其审美自足性遭到消解,与之相关的文学实践,在90年代以后也已不能应对更为复杂的文学语境,尤其是在通俗文化、文学的冲击下,失去了读者以及与社会呼应互动的能力,所以建构新的更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性”就成为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求。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学术体制与学科的逐步完善,文学研究反而越来越“科学化”“理论化”,这也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不满和反思。

在此背景下,由于各自问题意识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文学性”的思考,也有着两种不同面向:一是因不满于“文学性”理解的封闭狭窄,而致力于使“文学”与其他学科和外部世界相通、互动,建构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开放的“文学性”;一是因不满于文学成为文化、社会、历史等研究的材料,而致力于倡导更注重文学自身价值的文学研究,并在批评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发掘“文学性”的研究方法的探索。

当然,不同学者思考、探索的方向虽有不同,却共同分享着后理论时代的言说语境,有着一些共同的预设,比如对于“文学性”非本质主义的理解。南帆教授区分“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性。“本质主义”者认为,“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的诸多具体问题就迎刃而解”;而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则认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埋藏在

事物的深部,等待理论家的开采。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sup>(8)</sup>南帆显然是认同后者的。

关于“文学性”,他主要是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的角度予以重建,并以此对现代社会自然学科的支配性和“历史总体性”的压迫进行反抗。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来重建文学性看起来不免使人生疑,仿佛文学又将走到其他学科附庸的老路上去。而在南帆看来,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正是要打破原有的本质主义的、建基于“科学”之上的“形而上”的“文学性”认知。这一思路,也是建立于文学性的“非本质主义”理解之上,因为“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所以,建构新的“文学性”,发现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也同样不能孤立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sup>(9)</sup>这样的文化研究,不仅不会忽视文学“内部”问题,反而将“文学”从那个封闭的、僵硬的既有概念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活生生的流动性,也使其有能力与复杂多变的现实互动。

这样的“文学性”与文学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将文学从“科学”支配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深受自然科学思维影响的社会科学,注重的是都整体与共性,而容易忽视个体与差异。文学如何与这些更科学的学科区分开来,并与之形成有效的对话甚至对抗?南帆引入了“日常生活”的维度。

在南帆看来,在现代学科和知识分类系统将现代世界割裂,只有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混沌洪流”还保持着没有被学科肢解也不可能被科学整理的样子,远远溢出了“学科”同时也是“科学”可以容纳的限度,<sup>(10)</sup>由此,日常生活也以自身的“混沌性”动摇了看似坚固的学科界限。而当“日常生活”与文学结合,文学解放出日常生活的巨大能量,维护日常生活的整体性——虽然这种整体性常常表现为细节、琐屑、庸常——而也正是“日常生活”这种不够规整的特质,契合了文学对于个体的关注,赋予其逃逸甚至抗衡“科学”宰制的力量。<sup>(11)</sup>在知识分类日益细密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文学性也就具有了在严密的“科学”之外重新认识世界、将

现代人从被割裂中解救出来,使其重新恢复对世界的整体认知的可能。

### 三

具体到文学研究层面,在讨论如何使文学研究具有“文学性”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文学研究中“文学性”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在当前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理想中的“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张清华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状况,从逻辑层面来说,要保持四个方面的平衡,即科学性、当代性、人文性、文学性。其中科学性与文学性相关而又相互排斥。作为文学学科自身要求的科学性,在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广阔的同时,也会使文学研究失去文学性:“如科学性也可能会对当代性和人文性构成挤压,近年风行的‘文化研究’和‘历史批评’,就不同程度地带有弱化文学判断的倾向;而过分强调人文性和文学性,又可能造成对科学性的压抑,在过去若干年中,这类现象也不乏其例。”<sup>(12)</sup>

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状况各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更注重经验和常识,尊重文学本体的地位,也能有效回应时代思潮;90年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更重学院化和专业化,研究水准得到提升,但是“文本”地位下降,“理论”地位上升,理论压倒了文本,文学性和审美性逐渐消失;20世纪末以来,“历史化思潮”加强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文学性仍然遭到忽视。<sup>(13)</sup>

同样是“文化研究”,张清华与南帆看似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但实际上是分别讨论了“文化研究”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方向的功能与影响。对于南帆来说,他的重心既在于新的“文学性”理论的建构,看到的是之前“纯文学”概念面对新的文学与社会环境的难以为继,所以看到了理想中的文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解放性力量,努力引入更广阔、生动的内容,使“文学性”更具有开放性和面对现实的活力。对于张清华来说,他提倡“文学性研究”的现实背景,恰恰是“这些年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热’。”<sup>(14)</sup>张清华更多地是考虑具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所以他并没有否认文化研究等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的贡献。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了文化研究、历史研究、

社会学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才出现了新局面,有了更广阔的理论维度、国际视野,与国际同行、海外汉学界、华文文学界也有了更多交集与对话”<sup>(15)</sup>,这些都是新的视角、方法之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正面。他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之上,重新考虑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诉求”,并找到相对来说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这自然是因为“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在解放文学、打开“文学性”格局的同时,导致“文学性”概念的扩张,也带来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模糊,“文学”的确有可能重新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现象”与“材料”。

张清华对“文学批评”自身的要求,是“文本的及物性”与“现实的及物性”。前者指的是“能够通过其阐释实践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与文学经验予以总结,并将其归入到文学历史的知识谱系之中,成为文学研究的资源与组成部分”,后者则是“与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构成传达或回应的关系,成为参与创造和守护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的形式和有机部分。”<sup>(16)</sup>张清华的“及物”,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要与“文本”相契合,也包括了对相对具有整体性的文学与时代的概括与回应。

就时代而言,如果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状来看,就会发现,首先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出了问题。文学失去与时代呼应的能力,既是文学自身的原因——所以文学研究者才会调整“文学性”的概念与范围——也与时代变得复杂,失去了整体性,也失去了主导声音有关。当文学从一个大时代转向无数个小时时代,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很难像80年代那样,有一个主调,也自然会给人一种与时代失去密切联系的感觉。

就文本而言,则是与“科学性”直接相关。在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和历史化的动机,固然是重建文学性,使其更能有效回应、应对历史与现实,但自身也带有“科学性”,所以自然使文学学科化,也导致以自然科学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剪裁文学文本,以“科学”的坚硬尺度衡量相对感性、多义、模糊的文学,而事实上,往往恰是那些不够科学、不能被纳入科学视野、难以被科学方法解释的多余的部分,才是文学最根本的部分,或者说,恰是存在着“科学”无法解决的“余数”,才是文学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

说到这里,究竟如何在文学研究中保持“文学性”,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与可行的办法,“文学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张力使我们认识到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研究文学的方法与标准,所以张清华的提倡更多时候是通过描述、举例以及以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方法上的启发来实现的。

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篇论文中,张清华认为,从文学理论中寻找文学性的提法是徒劳的,所谓“与其寻找纯然的文学性方法,不如考虑研究的宗旨”,所以“区别文学性研究与否的方法也很简单,是接近于将文学当作文学文本看,最终关心文学本身的问题,或是文学质地的优劣,还是相反。”<sup>(17)</sup>这样的表述,自然是在尽量避免本质化的定义,以防将“文学性研究”固化为凝滞之物,反而失了“文学”的本旨,所以他罗列的几种界定,也相对宽泛,比如,“关注于文学本身问题的研究的”“研究路径虽然复杂,但意在关注作品的文学品质的”“关于作品的形式要素研究的,细读批评的”,甚至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凡是明显的‘非文学性研究’之外的”。<sup>(18)</sup>

从研究宗旨去认定“文学性”,与其说是界定,毋宁说是描述与举例,用的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是要从文学研究实践逆推何为“文学性研究”。从张清华的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心仪的“文学性研究”具有哪些特质。

被张清华作为“文学性研究”范例的,主要是胡河清的文学研究,也包括吴亮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和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两文。从张清华对他们的表彰和阐释中,可以看出他关注点仍是及物性,及物性在这里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方法是本土性和个人性。而本土性和个人性说起来其实是批评者的主体性。某种程度上来说,本土性是民族层面的主体性,而个人性是批评者个体层面的主体性。

当然,与其说本土性和个人性就是文学批评的标准,或者说最重要的特质,毋宁说这是在当下文学批评过度科学化和理论化背景下的一种补弊救偏策略。不论是科学性还是学科化、学院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化、历史化、理论化,其实都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关注本土性和个人性对科学性的反拨,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后者。如张清华对胡河清的文学批评特殊性的

概括,是“有本土话语风格”“有专业水准”“有个人气质”,因而“关注于文学本身”。<sup>(19)</sup>这里的“有专业水准”,就离不开科学性的存在。

同样,“本土性”也是如此,所以张清华在表彰胡河清的“本土性批评话语”的同时,也立即提醒,“不可以因此而堕入另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没有世界视野的出现,再道地的本土理论与概念之于当代文学与批评,也都是死东西,而不是活的东西”。<sup>(20)</sup>所以胡河清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文学批评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标准,而恰恰在于现在的文学批评话语过于忽视依赖外来批评话语而丧失本土性,与过于依赖科学话语而丧失了个人性。

旨归在及物,能够借鉴外来理论资源创造具有中国本土性的批评话语,具有个人的情感和体温,能与文本契合无间,甚至文学批评自身也是文学,而非无感情无主体的科学报告——这或许就是张清华理想中的“文学性研究”。

张清华自己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批评方法上的实践案例。他“借用叙事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其实还有结构主义甚至原型批评方法——发现其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所分析主要是两类文学作品,一是所谓的“红的经典”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准革命文学”,一是新潮文学、先锋文学等。对二者的研究,虽然看似出于同一思路,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其实有所侧重。“红色经典”等文学作品,不论是作者还是文本,都在努力求得与意识形态相契合,所谓的“潜结构与潜叙事”,更多的是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寻找作品中隐藏的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学套路,以发现意识形态以外的“文学性”,同时也证明“红色经典”也是可以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谈论的;而“先锋小说”等,由于作者有意识地探索潜意识中的人性,所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潜意识”更具有个人性,“潜结构与潜叙事”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发掘小说中的个人无意识与梦境隐喻。

张清华列举自己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的方法,当然也不是为“文学性研究”订立普适标准。与其说这一作为方法的批评实践是在建立标准,毋宁说是在例证如何寻找、使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试图说明一种批评实践及物与否,不在于特定方法本身,而在于是否根据研

究对象的特性选择与之相契合的方法,是否通过这一方法发现了文本蕴含的“文学性”。至少在具体的方法上,“文学性研究”没有一定之规。

#### 四

说到个人性和本土性,其实还涉及两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后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外来话语、理论的冲击下保持自身的主体性,保持对本土经验的敏感性;作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在科学化、学院化的学科背景下,保持个人的主体性和对世界、文学认知的整体性。

所谓的个人性,或者说个人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相对于科学性,一方面是相对于外来理论话语。就前者而言,是由于科学性会要求客观中立,消泯主观性,消除文学研究者作为个体的特殊性与主体性。这里其实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在科学方法和文学文本、现象之间是透明的,文学研究者应当隐身,这自然会导致文学批评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同时由于追求普遍性与规律性,科学性也可能会忽略文学的特殊性,不能识别不同作品(尤其是被归为同一流派、类型的文学作品)的优劣,也会使文学研究丧失文学性。

就后者而言,则是默认外来话语与本土文学经验之间的透明性,未经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本土性转化,从而导致理论话语的水土不服,与本土文学经验不能契合。当然,强调“本土性”,并不意味着对外来知识话语的排斥。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纯粹的本土,所有的“本土性”都在不断演化流动之中,要外来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冲击下常变常新,才能永远具有生命力,但是不论是割裂世界整体的科学性,还是作为它山之石的外来话语,都要经过研究者的主体这一中介,与本土经验、本土文化传统相接,实现创造性转化,才能有效处理中国的文学问题。

“文学性”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随着现实与理论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无法定义,我们只能从它要面对的问题来勉强捕捉其飘忽的踪迹——无论怎样理解“文学性”,它都要能够应对变动的现实与人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也是如此,研究者也应根据时代环境和理论背景,随时做出调整,而不论是侧重科学性,还是个人性与本土性,都要有及物性,都要能够有效地捕

捉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的轨迹,做出有效的阐释。

因此,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作为研究者个体的主体性是不可缺失的。科学方法、外来话语、现实经验、本土传统,所有的一切,都要与研究者的主体经验相融合、互动,才会产生出一个有情感有温度有判断的“我”,也才会产生出于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契合无间的“文学性研究”。

注释:-----

- (1)(5)[俄]雅各布逊:《现代俄国诗歌》,转引自鲍·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第24页。
- (2)(14)(15)(17)(18)(19)(20)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1期。
- (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 (4)[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 (6)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16期。
- (7)赖大仁:《“文学性”问题百年回眸:理论转向与观念嬗变》,《文艺研究》2021年9期。
- (8)(9)南帆:《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 (10)(11)南帆:《文学性、文化先锋与日常生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
- (12)(13)(16)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12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涛)